

美国公众涉台舆论 取向分析*

张传杰 付舒

【内容提要】 近几年,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弃台论”声音纷纷泛起,讨论热烈。这种“弃台”声音是否具有舆论基础,美国普通民众在涉台问题上持有怎样的舆论态度是作者探讨的主题。在对外政策舆论的研究中,鲜有学者对美国涉台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作者主要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974年到2010年的民调数据,整理了近40年来美国公众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舆论态度,以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美国公众涉台舆论的解释因素。在涉台问题上,美国公众的感情因素与理智判断是截然分开的,且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理智选择是不愿以武力保护台湾。美国公众涉台舆论态度可以用多个因素来解释:意识形态和党派的基本政治立场、国家安全态度与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对中国的感情温度在部分年份会影响美国涉台舆论,但解释效力不高;经济贸易态度对美国公众涉台舆论几乎没有显著的影响。总体来看,美国公众涉台舆论是较为理性的,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关键词】 公众舆论;对外政策;美国涉台舆论;弃台论

【作者简介】 张传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讲师;付舒,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3)07-0025-22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最近几年,美国学界“弃台”声音纷纷泛起,围绕“弃台论”的争论在美国学界掀起阵阵波澜。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伟博(Bill Owens)于2009年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重新检讨《与台湾关系法》,并认为美国对台军售已无必要。^① 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2010年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提出台湾正快速“芬兰化”,并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对台军售和为台湾提供军事保护。^②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史文(Michael D. Swaine)主张放弃里根总统提出的“对台六项口头保证”。他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美国的挑战:接触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中,明确阐述了美国现行对台政策应该改变,因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持续增长,而且政治上保持稳定和统一,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增长,北京对台湾的立场也会更为强硬。^③ 2011年11月,哈佛大学研究员保罗·凯恩(Paul L. Kane)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为救美国经济,放弃台湾》的文章,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台军售和军事援助,并以此为交换,说服中国取消美国1.14万亿美元的国债。^④

在众多弃台论调中,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著名的防御现实主义学者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的观点。2011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指出,美国应考虑逐步放弃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这样就能消除中美关系中最明显且争议性最大的冲突点,从而推动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十年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台海危机可能引发核战争和军备竞赛。美国现行政策是为减少台湾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而设计的,不过一旦台湾寻求独立,美国将被置于保护台湾的巨大压力之下”。^⑤ 2012年上半年,格拉泽在接受中评社采访时表示,仍坚持自己原先的观点:“虽然不支持立即打破美国的对台承诺,但美国必须考虑台海可能发生的状况,尽管目前比较安宁,但是这取决于台湾的政策,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出现悬崖(brink)。”^⑥

① Bill Owens, “America Must Start Treating China as a Friend,”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7, 2009.

② Bruce Gilley, “Not so Dire Strait: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1, 2010, pp. 44-60. 停止对台军售与为台湾提供军事保护,虽不直接意味着放弃台湾,但该言论也属于“弃台论”大环境中的一种言论,我们同样加以考虑。

③ Michael D. Swaine, *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p. 90.

④ Paul L. Kane, “To Save Our Economy, Ditch Taiwa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2011.

⑤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p. 88-90.

⑥ 参见《“弃台论”无情窥见了未来“美台关系”之走向》,环球网, <http://taiwan.huanqiu.com/opinion/2012-04/2645984.html>.

当然,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弃台论”仅是一种声音,并没有成为各方都认同的观点。很多人认为放弃台湾是战略大忌,美国不会轻易后撤。就在凯恩在《纽约时报》的轰动性文章发表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夏威夷发表演说明确指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安全与经济合作伙伴,美国将继续维持‘一个中国’政策及美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①目前,美国政府尚没有改变对台政策的意向,对台政策与以往是一致的。自由之家研究所副主任阿奇·普丁顿(Arch Puddington)在研究机构的博客中批评凯恩“以台湾换国债”的想法是“年度最差观点”。^②

虽然“弃台论”受到不少的抨击,而且目前美国对台政策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但是笔者认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学界在解决台湾问题和处理中美关系上,已经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想法。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弃台论”,不乏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在内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台湾问题不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美国迟早要面对这个中美之间最容易引发严重冲突的问题。“弃台论”的提出是在中国实力迅速上升、美国全球军事存在逐渐收缩的背景下产生的新思维。

美国的公众舆论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介入政府决策。在当今美国外交决策中,公众舆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舆论态度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宏观的和方向性的。^③2009年以来出现的“弃台论”是否早已在民意中有所反映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因此,本文将通过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CGA)^④和其他民调机构的民意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美国公众涉台舆论及其影响因素,试图探讨美国学界出现的“弃台论”的公众舆论基础。

二 文献回顾

公众舆论或称民意(public opinion),是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公共或政治问题表达出的看法,看法的背后是公民的政治态度。公众舆论的主体是相当数量的公民,客体以政治问题的范围为标准,主要分为国内政治舆论和对外政策舆论。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舆论是一个不同于国内政治舆论的信念体系,有其独特的结构与

^① 参见 Remarks by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mm/2011/11/176999.htm>。

^② Arch Puddington, “Worst Idea of the Year: Selling Out on Taiwan,” <http://www.freedomhouse.org/blog/worst-idea-year-selling-out-taiwan>。

^③ 王鸣鸣:《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80页。

^④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f Global Affairs, CCGA)的前身是美国芝加哥外交学会(Chicago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CCFR),于2006年更名。本文均使用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来统称。

解释因素。本文讨论的美国涉台舆论属于对外政策舆论。

个人的对外政策态度架构及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个人对外政策态度的集合就形成了对外政策舆论。但是,个人对外政策的态度偏好却是纷繁复杂的。为了更好地掌握民众的舆论态度,就有必要研究是否有简化的、核心的因素能够解释个人的态度偏好,因此,对外政策舆论的维度研究(dimensionality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便应运而生。对外政策舆论维度探讨的是哪些因素对民众的对外政策态度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公众舆论研究有大量的舆论调查作为研究数据,所以依托统计学对民调数据进行大样本实证分析成为了主要的研究方法。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民意调查数据和统计方法对影响舆论的因素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学者之间很难达成一致,从单一维度到多元维度的探讨持续了数十年。单一舆论维度体现了模型的优雅,多元舆论维度寻求更广泛的解释力。^①

有的学者倾向于单一舆论维度。奥利·霍尔斯特(Ole R. Holsti)把国家民众的想法按照参与国家事务积极程度分成三个聚类(cluster):冷战国际主义、后冷战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②不同的聚类在看待对外政策的时候是不同的。对国家事务的积极程度可以解释公众舆论态度。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等人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越战的公众舆论中,发现美国人对于越战的舆论是有序的,并可以用鹰派(鸽派的安全态度因素来解释。^③但是单一舆论维度的研究不免受到历史时期的局限,以上研究是对越战时期舆论的讨论,越战时美国公众的外交政策偏好并没有太大变化,因此容易得出单一变量的解释。如果考虑其他时期的对外政策,单一维度的解释力就可能会下降。

之后,有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有两个维度影响公众的对外政策舆论,但具体是哪两个因素尚未达成共识。马丁·帕琛(Martin Patchen)认为参与国际政治的积极程度和好斗(不好斗的安全观,是解释个人对外政策态度的因素。^④安德烈·莫迪利亚尼(Andre Modigliani)认为影响公众对外政策舆论的两个维度是国际参与程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⑤他根据自己提出的两个维度把民众分成四类,发现他们在对外政

① James A. Stimson, "Belief Systems: Constraint, Complexity, and the 1972 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 No. 3, 1975, pp. 393-417.

② Ole R. Holsti, "The Three-Headed Eag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ystem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3, No. 3, 1979, pp. 339-359.

③ Sidney Verba, et a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in Vietna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1, No. 2, 1967, pp. 317-333.

④ Martin Patchen, "Social Class and Dimensions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51, No. 4, 1970, pp. 649-667.

⑤ Andre Modigliani, "Hawks and Doves, Isolationism and Political Distrust: An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on Military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3, 1972, pp. 960-987.

策态度上恰好不同,而且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持二元舆论维度观点的学者中,尤金·维特克普夫(Eugene Wittkopf)最具影响力,他在分析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意调查中,发现两个正交的态度因素——合作国际主义(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ism, CI)和军事国际主义(Militant Internationalism, MI)——可以解释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①而且霍尔斯特也在对“对外政策领导计划”数据的分析中验证了合作国际主义和军事国际主义在解释舆论时是具有可靠性的。

但是,二元舆论维度在解释贸易问题和国外援助上仍面临一些困难,所以这也为多元舆论维度的讨论创造了空间。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认为,一个人是否赞同出兵保护其他国家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②不用说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就是在对外军事政策上也存在多个变量显著地起影响作用。芭芭拉·巴迪斯(Barbara A. Bardes)和罗伯特·欧登狄克(Robert W. Oldendick)发现了五个影响因素,并坚持认为对外政策舆论的维度是多元的。^③张传杰通过分析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对外政策态度调查数据,也认同舆论维度是多元的,他认为,国家感情形象、经贸观、国家安全观是影响中国人看美国的主要因素,尤其强调了国家感情形象可以解释受访者对他国政策的看法。^④

本文研究的是美国涉台舆论的解释因素,这属于对外政策舆论维度理论的应用研究。哪些因素影响美国民众对台湾的看法,众说纷纭。笔者经过梳理后发现,学者们所提出的因素无外乎感情印象和意识形态两类变量。

感情印象就是民众对一国的好恶感,这种感情有时会使民众的思维简化,帮助个人在缺乏事实性认识的情况下理解信息的含义。比如,喜欢伊斯兰文化的人就会倾向于支持与中东国家进行经贸往来,曾经到某一国家旅游的人会更愿意出兵保护该国。因此,对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感情印象会影响美国民众的涉台舆论态度。迈克尔·高(Michael Y. M. Kau)等学者在研究中美建交时期的美国舆论态度时,分析了美国人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感情因素。他们指出,虽然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但对中国大陆持积极态度的美国人,四个人中只有一个;相反,中国台湾在美国公众眼中则

① Michael A. Maggiotto and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4, 1981, pp. 601-630.

② Bruce Russett and Miroslav Nincic, "American Opinion on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Abroa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1, No. 3, 1976, pp. 411-431.

③ Barbara A. Bardes and Robert W. Oldendick,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A Case for Multiple Dimensions in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59, No. 3, 1978, pp. 496-508.

④ Chuanjie Zhang, "Affective US Image Predicts Chinese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United Stat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 293-323.

更受青睐,超过一半的民众对中国台湾持喜欢态度。因此,美国民意所支持的政策方案也是具有双重目标的,即与中国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对台湾实行军事保护。^①此外,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研究颇深的学者孙飞(Phillip C. Saunders)以美国视角看两岸关系时,指出随着中国台湾的民主取得成功且富有活力,美国人感情上更为青睐中国台湾,并对舆论上支持保护台湾提供了积极的基础。^②谢韬指出当被问及中国大陆问题、中国台湾问题时,美国人的回答会受自己对中国的感情印象影响。^③

学者们指出的影响美国涉台舆论的另一类因素就是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即“基于一个中心原则的信念体系,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即便是这个问题涉及领域很广,但他的想法总会受到他的中心原则所主宰,他的行为也是这些原则的体现”。^④奥利·霍尔斯特认为,意识形态是预测对外政策舆论的重要因素。^⑤余建军在分析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时也认为,拥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国民众会倾向于保护台湾。他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民主朋友’台湾以武力进行示威,这就等于是挑战其民主价值观,美国公众不会无动于衷的”。^⑥张光、刁大明在分析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分布中,也通过实证方法得出结论:意识形态保守的议员参与机率较高。^⑦

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 Page)和马歇尔·布顿(Marshall M. Bouton)基于对2002年以前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数据,在分析民众对外政策偏好的影响因素时提出了“目的性信仰体系(purposive belief systems)”模型。他们认为,基本政治态度(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党派、国际事务积极性)、外交政策目标与感知的威胁、对他国的情感态度是解释理性民众对外政策偏好的因素。^⑧根据该模型,他们还对美国涉台舆论进行简明的阐释,认为愿意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民众和保守的民众倾向于

① Michael Y. M. Kau, et al., “Public Opinion and Our China Policy,” *Asian Affairs*, Vol. 5, No. 3, 1978, p. 134.

② Phillip C. Saunders, “Long-Term Trends in China-Taiwan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U. S. Taiwa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45, No. 6, 2005, pp. 970-991.

③ 谢韬:《从民意调查看中国的对美外交和中美关系》,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69页。

④ Herbert M. Kritzer, “Ideology and American Political Elite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42, No. 2, 1978, pp. 484-502.

⑤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151-156.

⑥ 余建军:《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第76页。

⑦ 张光、刁大明:《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分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3期,第1-11页。

⑧ Benjamin I. Page and Marshall M. Bouton, *The Foreign Policy Disconnect: What Americans Want from Our Leaders but Don't Ge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 28-32.

以武力保护台湾安全。^①

通过对以往文献进行回顾,笔者发现,对于美国公众的涉台舆论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已有的文献多以描述性为主,仅对民意调查进行数据的汇报整理和解读,鲜有利用统计方法对美国涉台民意进行实证分析的。而国外学者,如佩奇和布顿,对美国涉台舆论的讨论也只是点到为止,对美国涉台舆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发掘空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笔者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974年到2010年的民调数据,对近40年来美国公众涉台舆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还分析了美国其他民调机构的民意调查数据,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笔者以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美国公众涉台舆论的解释因素,即用实证的科学方法,在公众舆论的微观领域探索影响舆论的因素。笔者回归分析使用的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民调数据,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新的四次数据。由于这四次民调数据中关于台湾的问题基本一样,笔者将四次数据加以整合,汇成一个大的数据库,力求更为准确地把握影响美国涉台舆论的解释因素,从而保证本研究较高的内在效度,确保结论的可信性。^②

三 数据与方法

笔者搜集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盖洛普、皮尤和佐格比等主要调查机构与中国和台湾相关的舆论调查数据以及全球公众舆论(world public opinion)、舆情报告(polling report)等网站整理的民调数据。其中,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不仅有对美国人如何看待台湾问题的设问,而且它从1974年开始每四年进行一次调查,到2002年之后每两年调查一次,每次调查都有相同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纵向数据,从而为更好地研究美国涉台公众舆论的变化趋势提供了可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从1974年到2010年共进行了12次对外政策民意调查,本文选取最近的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四次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③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

^① Benjamin I. Page and Marshall M. Bouton, *The Foreign Policy Disconnect: What Americans Want from Our Leaders but Don't Get*, pp. 126-127.

^② 关于对外政策舆论研究内在效度的问题,参见张传杰:《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49-58页。

^③ 本文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全球视野: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的民调数据,其数据库编号分别为ICPSR4137、ICPSR4650、ICPSR26301和ICPSR31020。

员会从2004年开始将对外政策民意调查更名为“全球视野: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并均采用网上调查的方式,而且每次调查的设问几乎完全相同,这为之后的比较和整合提供了可能,为研究结论的信度和稳健性提供了保障。由于问卷采取网络调查的形式,为了弥补网络舆论调查抽样的偏差,调查公司首先对美国公民进行随机抽样,并对没有网络设备的民众提供硬件和网络渠道。

我们对四次调查的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和重新赋值,共整理了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和四年整合数据共五个数据库。^①以最令人关注、最敏感、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否赞成美国以武力保护台湾”作为因变量,测量美国民众对台湾问题的舆论态度。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我们选取了可能影响涉台舆论的国家安全态度、经济贸易态度、感情温度、威胁感知、意识形态和党派作为主要的自变量,^②同时,在民调问卷中选取与自变量涵义相对应的问题作为自变量的概念进行操作,并对一些常见的人口、社会经济变量进行控制。

在因变量的选择方面,因为“是否赞成美国以武力保证台湾安全”是中美之间讨论台湾问题的核心,而在2004-2010年的“全球视野”民意调查中都设有同样问题:“当中国大陆军事攻击中国台湾时,你是否赞成美国政府出兵?”回答包括三个选项:赞同、反对、拒绝回答(或不知道)。我们把因变量设为二分类虚拟变量,令赞同为0,反对为1,并令拒绝回答为缺失值,将它们从我们的数据分析中剔除。^③

在自变量的选择方面,笔者选取了国家安全态度、经济贸易态度、感情温度、威胁感知、意识形态和党派作为主要的自变量。这里的国家安全态度,更直接地说就是“鹰派”或“鸽派”。一般来说,鹰派人士都赞同设立海外军事基地、增加国防预算等行为,而鸽派则偏向外交途径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增强沟通等行为。在“全球视野”民意

① 笔者把四年数据进行合并组成一个新的数据,目的是在因素分析中把握各自变量的整体影响程度。考虑到由于样本增加会提高自变量的统计显著性,而降低统计显著性的解释效力,因此我们会同时考虑各自变量的实质显著性。

② 本杰明·佩奇和马歇尔·布顿也以“是否赞成美国出兵的各种情形”为因变量,探讨影响该民意态度的因素。他们的模型中分四步分别带入口口经济变量、人口经济变量与基本态度、人口经济变量与基本态度与目标、目标与基本态度。但是没有展开分析“是否赞成美国出兵保护台湾”的情况,而且没有感情温度的回归数据。参见 Benjamin I. Page and Marshall M. Bouton, *The Foreign Policy Disconnect: What Americans Want from Our Leaders but Don't Get*, 2006。

③ 这里把“拒绝回答”设为缺失值是因为它对解释问题意义不大,并且本杰明·佩奇和贾森·巴拉巴斯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不知道”这类回答经常因时间和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参见 Benjamin I. Page and Jason Barabas, “Foreign Policy Gaps between Citizens and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3, 2000, pp. 339-64。而且,从2004年到2010年拒绝回答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4%、5.9%、2.1%和1.9%,将其设为缺失值对统计结果影响不大。同样的道理,自变量中“拒绝回答”选项也均被设成缺失值。系统缺失问题,这是问卷中难以避免的情况,在此不做更多讨论。

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考虑到美国长期的海外军事基地，你认为美国应该增加，减少还是保持现状？”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直接对应民众的国家安全观，令“增加”为1，代表鹰派；令“保持现状”为0，代表中间派；令“减少”为-1，表示鸽派。

经济贸易态度指的是一个人对待国际自由经济贸易的态度，两个极端分别是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主义者遵循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教义，提倡全球化，呼吁自由开放，认为自由竞争为企业和国家创造自然的发展空间。^①而贸易保护主义则为防止本国商品受到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冲击，向本国商品给予一系列优惠的主张，偏向于反对全球化。在“全球视野”民意调查中设有调查问题与此对应：“你认为全球化，尤其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总体上是好的还是坏的？”对该设问有两种回答，令“总体上是好的”为1，令“总体上是坏的”为0。经济贸易态度变量在以往的对台舆论维度研究中没有出现，但是笔者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合作十分密切，且美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往来也较为频繁，因此经济贸易态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对具体国家的印象会影响个人的对外政策态度。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认为，政策制定者往往会依赖具体情形中的主观印象。^②所以如果对一个国家持正面印象，则会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避免冲突；如果对一个国家持负面看法甚或憎恨某个国家，选择对抗性政策的可能性则更高。在“全球视野”民意调查中，始终都设有一个系列问题询问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感情温度，0度为最低，50度为不冷不热，100度为最高。在2004-2010年的四次CCGA民调中，没有直接询问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的感情温度，本文选择的是美国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感情温度。我们一般认为，对中国大陆好感强的民众可能不希望美国武力介入台湾问题。

民众对于某种威胁的感知会影响他们的对外政策偏好。比如，认为恐怖主义威胁很大的民众会更倾向支持进行反恐战争。在CCGA民调中询问了民众对一系列事件或情况的威胁感知，其中包括“您认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有多大”。对该问题的回答有三个选项，我们分别令“不是重要威胁”为1，令“重要威胁但不严重”为2，令“严重威胁”为3。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感知很可能影响美国民众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崛起是严重威胁的民众会更倾向于以武力保护台湾。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解释对内政治舆论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无法单

^①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Chapter II, Raleigh: Hayes Barton Press, 2001, p.456.

^② K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959, pp. 120-131.

独解释民众的对外政策态度。不过,意识形态仍是一个重要的变量,甚至在一些对外政策具体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文献回顾中我们发现,在美国涉台舆论方面,意识形态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全球视野”民意调查中对调查者意识形态的提问,被调查者几乎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民意调查中对意识形态的回答,从极端自由主义到极端保守主义共有七个等级,本文对“极端自由主义”赋值为3,“自由主义”为2,“倾向自由主义”为1,“中间派及自由人士”为0,“倾向保守主义”为-1,“保守主义”为-2,“极端保守主义”为-3。

党派变量在之前的公众舆论维度研究中并没有哪位学者单独提及,但我们仍把它作为主要自变量来考虑。因为笔者希望探寻党派的区别对于如何看待台湾问题是否有显著的差别,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自我宣称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在台湾问题上的大致态度。与意识形态一样,党派的划分也有七个等级,相应地,本文对“坚定的民主党”赋值为3,“一般的民主党”为2,“倾向民主党”为1,“中间派及自由人士”为0,“倾向共和党”为-1,“一般的共和党”为-2,“坚定的共和党”为-3。

同时对一些人口、社会经济变量进行控制,观察加入这些变量是否影响自变量解释效力。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对国际新闻的关注程度、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在我们使用的民调数据中均有对这些变量的直接设问。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共提出了以下六个研究假设:

假设1:鹰派人士相对于鸽派人士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

假设2:贸易保护主义者相对于自由贸易者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

假设3:对中国大陆印象不好的人士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

假设4:认为中国崛起是严重威胁的人士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

假设5:保守主义人士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

假设6:共和党人士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所以本文运用逻辑回归检验每个自变量因素的影响效力。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假设5讨论的意识形态与假设6讨论的政党派别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原因不难分析,在外交政策上,共和党人士多持保守主义观点,而民主党人士则青睐自由主义的对外政策,这与对美国政治的观察基本一致。所以,笔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两个变量分别带入模型,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①因此,

^① 意识形态与党派之间具有强相关性,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数据和整合数据中,二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9、0.441、0.624、0.604和0.561,且均在0.01水平上具有双侧统计显著性。如果把两个变量同时带入模型,不影响其他自变量系数的统计显著性,但因为多重共线性,会削弱党派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故将两个变量分别带入模型考察。

每一年份的数据共有四个模型:把国家安全态度、经济贸易态度、感情温度、威胁感知和意识形态带入模型 1;模型 2 中党派替换意识形态,其他变量不变;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4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人口、社会经济的控制变量。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美国民众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关切

在美国涉台舆论中,核心是安全问题。美国和台湾是实际上的盟友,台湾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被看做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也把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法律化。近年来,每当美国政府对台湾出售武器时,中美关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倒退。那么美国民众是如何看待该问题的呢?

在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 40 年的民意调查中,始终有一个关于“美国武力使用”的系列问题,其中就有一个选项是“当中国大陆进攻中国台湾时,是否同意美国政府出兵”。对于美国以武力保证台湾安全,这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①也是美国民意调查机构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除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盖洛普、《华盛顿邮报》等在民意调查中都有涉及。^②这也足以彰显是否同意以武力保护台湾是美国涉台舆论中的核心问题。

如图 1 所示,我们发现美国普通民众对“是否以武力保护台湾”的态度从 1974 年到 2004 年呈上升态势,但赞成武力保护台湾的受访民众也不到 1/3,即大部分民众并不赞成美国政府以武力保证台湾安全。在最初的三次调查(1974 年、1978 年、1982 年)中赞同率很低,最高也只有 25%。之后的三次调查没有对该问题进行设问。1998 年重新提出后呈现上升趋势,但支持率仍在 30% 左右。1995-1996 年的台海危机后,也不过只有 27% 的民众赞成武力介入台海争端。2000-2008 年民进党在台湾地区执政时期,台独气焰不减,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但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反对武力保护台湾。反而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上升,2004 年之后武力保护台湾的支持率呈现下降趋势,于 2010 年最近一次调查中降到 25%。

相比普通民众,美国精英的涉台舆论变化却更为明显。在 1982 年之前只有少数政治精英支持武力保护台湾(分别是 11%、15% 和 15%),且小于普通公众的支持度。

^① 谢韬、梅仁毅:《美国政治精英和公众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与分歧》,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10 期,第 29 页。

^② 参见 http://www.americans-world.org/digest/regional_issues/china/china7.cfm。

因为信息的不对称,美国政治精英意识到了大势所趋的中美建交,并不愿意破坏中美建交初期的两国关系,且美国的政治精英比普通民众更为重视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但是1998年以后,精英阶层对该问题的赞同率出现激增,超过了50%,并大大超过了民众的赞同度,两者的差别分别达到24、20、18个百分点。在涉台问题上,美国的精英舆论与普通民众舆论出现了差异。在2004年之后,我们就不再有精英舆论态度的数据了。但是根据前文提到的美国学界和政界出现了“弃台论”,我们推测美国精英支持武力保护台湾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下降。

我们仔细观察近十年的美国涉台舆论态度。图2描述了这四次调查中,美国民众赞成以武力保护台湾的有效百分率(valid percent),即不包含拒绝回答或不知道的情况。我们发现表态的美国民众中只有1/3左右赞成出兵保护台湾,而且如果包括了拒绝回答和不知道的情况,赞同的比例会更低。总的来说,美国公众舆论不太赞同冒着与中国大陆交战的风险而出兵保护台湾。不仅如此,从趋势上来看,赞同出兵的美国公众比例越来越小,并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从2004年的35.5%降到了2010年的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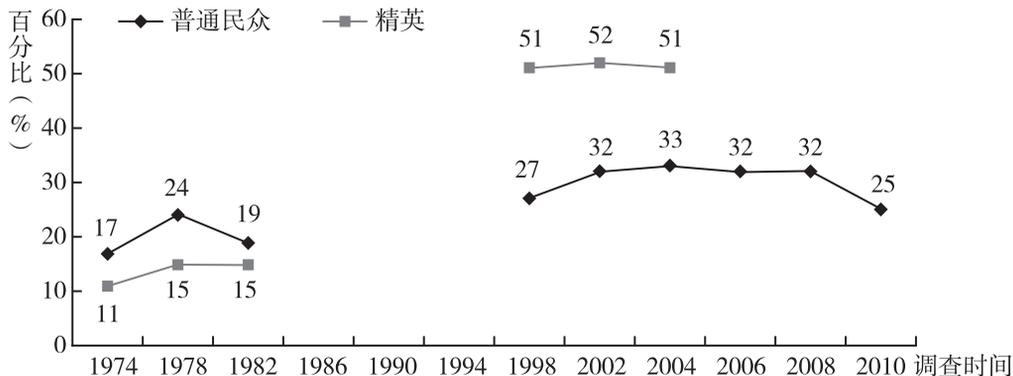


图1 美国精英与普通民众对于以武力保证台湾安全的赞同率

资料来源: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974年至2002年“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的调查与2004年至2010年“全球视野: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Global View: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的调查。

(二) 影响公众涉台舆论的理智与情感因素

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为,导致军事干预的重要因素是对重大国家利益的理智判断。2002年以前的问卷中包含一些问题,询问美国公众是否认为美国在一系列国家或者地区有重要利益,其中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均被问及。把民众对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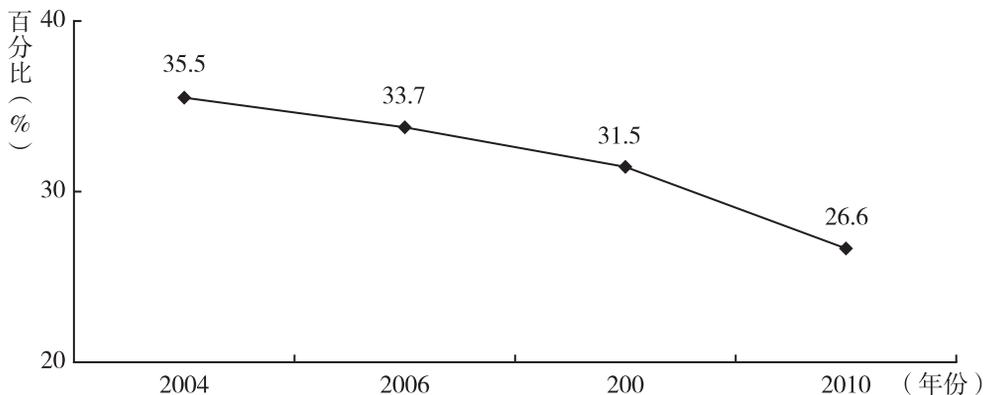


图2 2004年到2010年美国民众赞成以武力保证台湾安全的有效百分率

资料来源: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4年至2010年“全球视野: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Global View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的调查。

益判断进行比较(参见图3),大致一半民众同意美国在台湾有重要利益,虽然总体趋势略有上升但变化幅度不大。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始终认为中国大陆的重要程度高于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对美国有重要利益的比例不断上升,在2002年达到最大值(中国台湾65%,中国大陆83%),这与中国的崛起密不可分。中国国家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更加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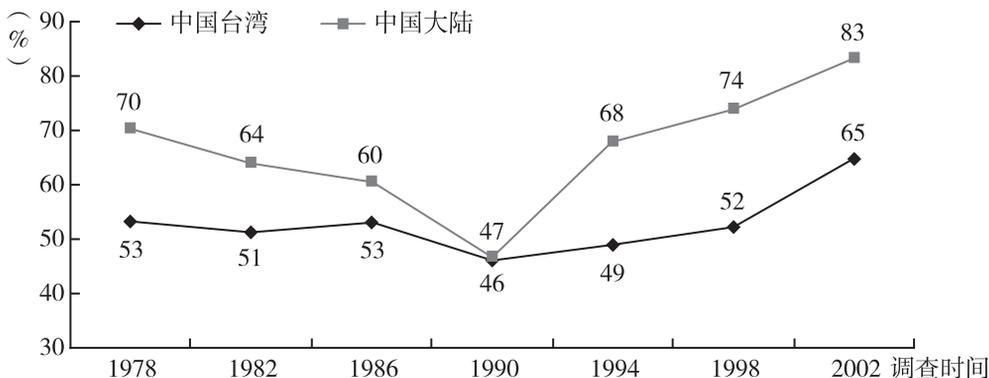


图3 美国公众心中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重要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974年至2002年“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的调查。

关于对中国台湾的感情温度(参见图4),美国公众对中国台湾的好感是十分

稳定的,几乎没有什么波动。在20世纪后20年,美国公众对中国台湾的感情都在50度上下,可谓不冷不热。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这种不冷不热的感情,正反映出美国人心中的一种矛盾,既承认与中国台湾没有正式交往,但又希望继续与中国台湾保持密切关系。如果比较美国民众心中对海峡两岸的好感,虽差值不大但对中国台湾的感情温度一直更高。因为中国台湾和美国是事实上的同盟,而且中国台湾与美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更为相近,所以美国民众在感情上更偏爱中国台湾。

对比以上两个问题,观察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感情温度差值与利益判断差值,笔者发现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在2002年以前,美国民众始终认为中国大陆的重要程度高于中国台湾;与此相反,美国民众在感情上却更偏爱中国台湾。重要程度可谓民众理智的利益判断,感情温度则是一种情感态度,在看待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上,美国民众在理智与情感上做出了相反的选择,理智上十分明确美国在中国大陆有更大的利益,但情感上却更喜欢中国台湾。在中美建交之初,美国的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也似乎与美国民意相一致,采取了双重目标政策,即与中国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对中国台湾实行保护。^①

我们发现,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民众能够把利益计算与感情态度截然分开。作为影响民众涉台舆论的感情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民众对台政策的判断以及是否有其他因素发挥更重要的影响作用,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用实证分析尝试给出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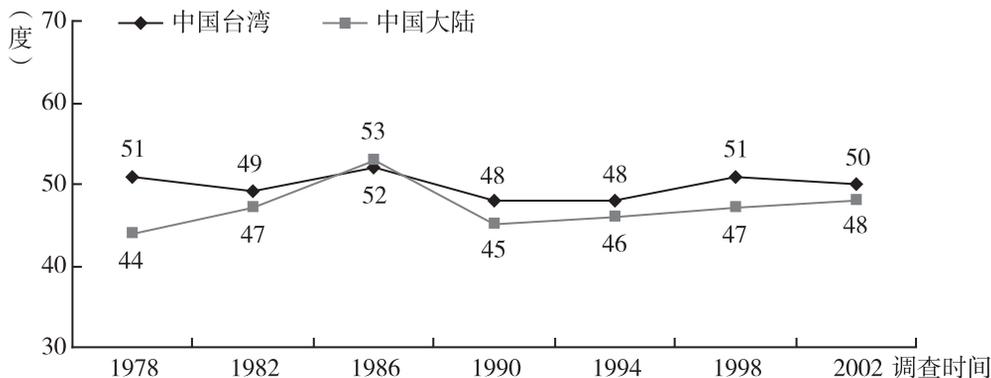


图4 美国公众对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感情温度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974年至2002年“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的调查。

^① Michael Y. M. Kau, et al., “Public Opinion and Our China Policy,” p. 147.

(三) 美国涉台舆论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表1呈现了在整合数据库中,所有自变量在因变量等于0(赞同美国以武力保证台湾安全)的简单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初步验证了部分假设。在国家安全态度上,鹰派人士比鸽派人士更主张出兵保护台湾,赞同比例是鸽派的两倍,可见国家安全观对于解释美国涉台舆论是很有说服力的。经贸态度在该问题上并没有体现明显的区别。我们把对中国大陆的感情温度从0度到100度划分出五个区间,可以发现对中国的感情在美国人如何看待台湾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感情越不好,越倾向于赞同美国出兵保护台湾。但是该趋势并不明显,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中国的感情对公众涉台舆论有显著的影响。^① 感知到的中国崛起威胁越大,越倾向于以武力保护台湾。意识形态和党派非常相似,而且都明显地呈现出了影响力,意识形态越保守或越坚定的共和党人,越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其背后的军工集团支持是不可忽略的。

表1 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赞同美国以武力保护台湾的受访者人数与百分比)

政治态度	减少 245 (22.8%)	保持现状 674 (35.3%)	增加 204 (44.1%)				
经济态度	全球化 不好 474 (30.0%)	全球化 好 802 (32.8%)					
感情温度	非常不好 (0-20度) 293 (34.9%)	不好 (21-49度) 323 (32.4%)	不好不坏 (50度) 318 (28.7%)	好 (51-79度) 220 (33.0%)	非常好 (80-100度) 74 (28.4%)		
威胁感知	不是重要 威胁 80 (20.5%)	重要威胁 但不严重 682 (29.5%)	严重 威胁 632 (37.4%)				

^① 影响美国涉台舆论的感情态度,由于中国台湾是武力保护方,最直接的因素应该是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的感情温度。但是回归所使用的民意调查中并没有对中国台湾进行设问,因此我们只能采取与之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对中国大陆的感情温度。一般会认为对中国大陆好感强的民众可能不希望美国武力介入台湾问题。

续表

意识形态	极端保守主义 80 (47.1%)	保守主义 351 (40.9%)	倾向保守主义 221 (34.5%)	中间派及自由人士 506 (29.3%)	倾向自由主义 113 (24.2%)	自由主义 95 (25.4%)	极端自由主义 34 (23.9%)
党派	坚定的共和党 305 (43.8%)	一般的共和党 199 (31.3%)	倾向共和党 122 (36.1%)	中间派及自由人士 271 (30.2%)	倾向民主党 89 (23.4%)	一般的民主党 196 (27.5%)	坚定的民主党 218 (29.1%)

资料来源: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全球视野: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Global View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的调查,2004-2010年的整合数据库。

注:数值表示选择该选项的人数;括号内表示在这些人中选择赞成以武力保护台湾的比例。

表2 “全球视野” 民调数据各自年份的逻辑回归分析结果^①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截距	1.635*** (0.336)	1.591*** (0.334)	1.233*** (0.324)	1.159*** (0.320)	1.566** (0.718)	1.159*** (0.320)	1.205** (0.484)	1.139*** (0.048)
安全态度	-0.395*** (0.107)	-0.400*** (0.107)	-0.344*** (0.105)	-0.359*** (0.104)	-0.129 (0.230)	-0.359*** (0.104)	-0.615*** (0.159)	-0.570*** (0.159)
经贸态度	-0.135 (0.150)	-0.112 (0.148)	-0.186 (0.145)	-0.173 (0.143)	-0.311 (0.286)	-0.173 (0.143)	-0.055 (0.204)	0.020 (0.200)
感情温度	-0.002 (0.003)	-0.002 (0.003)	0.007** (0.003)	0.008*** (0.003)	0.004 (0.006)	0.008*** (0.003)	0.001 (0.004)	0.000 (0.004)
威胁感知	-0.416*** (0.116)	-0.426*** (0.115)	-0.293** (0.115)	-0.313*** (0.114)	-0.257 (0.246)	-0.313*** (0.114)	-0.104 (0.163)	-0.111 (0.163)
意识形态	0.199*** (0.052)		0.186*** (0.055)		0.231** (0.106)		0.240*** (0.070)	

① 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只有2004年模型中党派的因素,在加入人口、社会经济控制变量之后,显著性有微小的下降,p值从0.007变为0.017;其他主要自变量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显著性均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因此,我们在表2中仅汇报含有主要自变量的模型1和模型2,而不对各年份的模型3和模型4进行汇报。

续表

	2004 年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党派		0.090*** (0.033)		0.039 (0.032)		0.039 (0.032)		0.161*** (0.048)
n	965	978	1015	1021	264	1021	574	583
χ^2	50.004	42.887	45.487	35.112	9.425	35.112	37.221	34.626
Nagelkerke r^2	0.069	0.059	0.061	0.047	0.050	0.047	0.090	0.083
d. f.	5	5	5	5	5	5	5	5

注: * p<0.1, ** p<0.05, *** p<0.01(双边检验);括号中的值是标准误。

表 3 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整合数据的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截距	1.386*** (0.200)	1.315*** (0.198)	2.466*** (0.319)	2.420*** (0.317)
安全态度	-0.378*** (0.064)	-0.386*** (0.064)	-0.415*** (0.066)	-0.426*** (0.066)
经贸态度	-0.193** (0.087)	-0.154* (0.086)	-0.137 (0.090)	-0.106 (0.088)
感情温度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威胁感知	-0.285*** (0.002)	-0.300*** (0.069)	-0.286*** (0.072)	-0.302*** (0.071)
意识形态	0.200*** (0.031)		0.200*** (0.059)	
党派		0.080*** (0.020)		0.076*** (0.020)
国际时事 关注程度			-0.207*** (0.059)	-0.195*** (0.058)
性别			0.382*** (0.085)	0.384*** (0.084)

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年龄			-0.002 (0.003)	-0.004 (0.003)
受教育程度			-0.142*** (0.047)	-0.140*** (0.046)
个人收入			0.013 (0.011)	0.013 (0.011)
年份(2004年)			-0.493*** (0.120)	-0.466*** (0.118)
年份(2006年)			-0.224* (0.119)	-0.238** (0.118)
年份(2008年)			-0.126 (0.170)	-0.134 (0.169)
n	2818	2843	2815	2840
χ^2	125.686	98.567	198.608	170.075
Nagelkerke r^2	0.061	0.047	0.095	0.081
d. f.	5	5	13	13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双边检验); 括号中的值是标准误。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首先通过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的整合数据,总体地了解近十年美国涉台舆论。国家安全态度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0.408和-0.418,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1$),说明在控制了其他主要变量后,鹰派人士比鸽派人士更显著地支持美国出兵保证台湾安全。在模型3和模型4中,加入所有的控制变量以后,统计显著性没有变化。不仅如此,国家安全态度除了具有统计显著性外,也有较好的实质显著性。在模型1中当其他自变量为定值时,安全态度由鸽派变为鹰派,反对出兵的概率下降了16.3%(参见表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受调查民众的安全观对美国公众的涉台舆论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验证了假设1是成立的,即国家安全态度对美国涉台舆论有显著的影响,鹰派人士更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

自变量的实质显著性^①

	2004 年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	2004-2010 年整合数据
国家安全态度 (从-1 到 1)	-18.0%	-14.9%	-5.3%	-24.0%	-16.3%
经济贸易态度 (从 0 到 1)	-3.0%	-3.9%	-5.9%	-1.1%	-4.1%
感情温度 (从 0 度到 100 度)	-4.6% ^②	14.8%	8.1%	2.0%	6.5%
威胁感知 (从 1 到 3)	-18.9%	-12.7%	-10.5%	-4.1%	-12.4%
意识形态 (从-3 到 3)	26.8%	24.0%	27.9%	28.0%	25.7%

贸易自由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经贸态度,只在整合数据的模型 1 中存在较弱的统计显著性,而且加入控制变量之后,显著性消失;在各年份的所有模型中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假设 2 的成立,美国民众的经贸态度对涉台舆论的影响程度很小。看来美国民众的经贸态度不会对是否以武力保护台湾构成太大的影响。

前文提到美国涉台舆论中的感情因素与理智判断是截然分开的。在回归中我们发现感情温度的系数为正,表示受访者对中国越有好感,越不支持美国政府动武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感情温度的显著性却不高,只有在 2006 年数据和整合数据中的模型 2 与模型 4 中有统计显著性。考察感情温度的实质显著性,当其他自变量取定值,对中国的感情从 0 度变到 100 度时,整体来看反对出兵保护台湾的比例只提高了 6.5%。因此,我们发现感情印象造成对外交政策舆论“一刀切”的情况没有出现。这与此前学者们对感情因素、国家印象的重视有所不同,这或许说明了,美国民众在看待台湾问题方面,情感因素的影响力有限。有趣的是,2006 年的民调数据中,感情温度确有很好的显著性($p < 0.01$),实质上也会导致因变量 14.8% 的变化程度。这说明感

① 表 4 中的百分数值代表某自变量变化所导致的 $P(Y=1)$ 的变化量,即反对美国武力保护台湾的概率变化量;当考察某一自变量的实质显著性时,国际政治态度、经济贸易态度、威胁感知和意识形态都是分类变量,因此取众数;感情温度是连续变量,取该年份的平均值。然后统一带入模型 1,算出因变量的变化百分比。

② 2004 年数据的模型 1 中,感情温度的系数符号为负,表 4 中的实质显著性也发生了负向的变化,这与其他年份的情况不同。但是,由于 2004 年感情因素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系数与 0 的大小关系没有实际解释意义,因此我们不作更多考虑。

情因素在某些年份才会影响美国涉台舆论,美国民众在2006年对台湾的舆论态度就明显受到了对中国感情态度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假设3在2006年数据中成立,但在2004年、2008年和2010年的数据中并不成立。

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也显著地影响美国涉台舆论。从整合数据中我们看到,系数为负,代表对中国威胁的感知越大,即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民众,越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而且在整合数据中的四个模型中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p < 0.01$)。从实质显著性上看,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从最弱到最强,会增加12.4%的比例支持美国武力保护台湾。不过,从具体年份来看,2004年和2006年的民调显示对中国威胁的感知有显著的影响力($p < 0.01$),而在2008年和2010年的民调中这种影响力却并不显著。但整理数据中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和实质显著性让我们有理由证明假设4的成立,认为中国崛起是严重威胁的人士倾向于武力保护台湾。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所有变量中解释力最好的,它在所有模型中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样本量较少的2008年民调中,意识形态是唯一具有显著性的自变量。从实质显著性上看,在四年的民调数据和整合数据中,意识形态从极端保守主义到极端自由主义的改变,均导致了因变量最大程度的变动,高达25.7%。因此,我们有信心认为假设5成立,即保守主义人士倾向于动用武力保卫台湾,自由主义人士倾向于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台湾的舆论方面,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态度呈现出鲜明的不同。可以看出,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仅坚持美国传统的安全观,还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看的比较重,更重视台湾的地位,愿意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国。此外,很多保守主义者都与军工集团有密切的联系,更可能倾向于对台湾出兵保护其安全。

党派性质与意识形态相似,也拥有较好的统计显著性。总体来看,党派因素是有很高统计显著性的,可以证明假设6的成立,但在统计结果上看党派的解释力不如意识形态强。在2004年和2010年的数据中,党派变量均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1$)。但在2006年和2008年的数据中,党派在解释因变量上没有显著性。也就是说,党派在部分年份的解释力强,部分年份的解释力弱。但整合数据告诉我们,党派对于是否以武力保护台湾的民意态度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根据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党派性质给民众的涉台舆论以大致推断。

通过以上的逻辑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影响美国涉台舆论的因素是多元的,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不能完全解释美国人对台湾的舆论态度,且这些多元因素的影响效力有高下之分。意识形态的解释力最强,国家安全态度和政党派别也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台湾问题,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对舆论的影响力较强,但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态度,感

情因素在某些年份影响力也比较大,整体上并无显著影响力,我们无法证明经贸态度对美国涉台舆论构成影响。解释力较强的意识形态、党派和国家安全观都属于公民的基本政治立场,本着政治立场的民意判断是一种理性选择,这表明美国涉台民意中的理性因素是主导;解释力其次的是对中国威胁的感知,这表明对是否支持武力保护台湾的问题上,不是单一理性变量就能解释的;对中国的感情温度是美国民众看待台湾问题时的情感因素,它只在部分年份有显著影响,整体来看影响力并不大,表明美国民众在台湾问题上的舆论态度较为理性。

五 美国民众理智的“弃台”倾向

我们已经就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如何看待台湾问题做了数据上的描述性解读,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然后我们对民调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分析了美国公众涉台舆论的影响因素,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下一步,我们通过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的其他问题和一些其他机构的民调数据来进一步验证我们在统计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已经发现,美国绝大部分民众并不希望以武力保护台湾安全,而且在2004年之后支持率稳步下降。如果我们与该系列问题的其他选项进行对比,会发现美国民众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反对动武的。在使用武力阻止外国政府大规模屠杀人民和使用武力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上,均有70%左右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但是,对出兵保护台湾安全的问题,2010年的问卷中(参见表5),其支持率在8种情形中排在倒数第一(25%),而且与其他选项的支持率差距达到了15%以上;2008年的民调数据列出的6种情形中,其支持率仍然是最少的(32%);在2006年所列出的11种情形中,支持率排名倒数第二(33%),仅次于“对独裁国家使用武力使其民主化”(26%)。因此,美国民众在武力保卫台湾方面的不情愿程度可见一斑。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全球视野”民调中的另一个系列问题是询问美国民众“下列情况多大程度威胁美国重大利益”,从2006年开始增设了“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之间发生对抗”的情况。认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军事对抗“严峻”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比例从2006年到2010年分别为18%、19%和20%,在所有情况中严峻程度排名倒数第一。美国民众并不认为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抗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严峻挑战,这种态度与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保护台湾安全是一致的。从最近的2010年数据我们看出,美国人心严重威胁国家重要利益的情况主要有两类:一类有关美国国土安全,如恐怖主义、敌对国家拥有核能力等;另一类有关美国经济发展,如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

赖、能源供应的中断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国债等。在这些威胁中,海峡两岸的对抗在美国民众的视野中并不处于重要位置(参见表6)。

表5 使用武力各种情况赞成率排序(2010年数据)

情况	赞同率(%)
为了阻止一国政府大规模屠杀其人民	72
为了处理人道主义危机	69
为了参加国际维和来组织达尔富尔的杀戮行为	56
为了保障石油供应	55
为了参加国家维和来促进巴以和平进程	49
如果以色列遭到邻国攻击	47
如果朝鲜入侵韩国	40
如果中国大陆入侵中国台湾	25

资料来源: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10年“全球视野: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Global View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的调查。

表6 认为以下情况严重威胁美国重大利益的比例(2010年部分数据)

情况	比例(%)
国际恐怖主义	73
敌对国家拥有核武器	69
伊朗核计划	68
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62
能源供应的中断	54
美国对中国的国债	51
涌入美国的大量移民和难民	51
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的武装冲突	45
中国发展为世界强国	43
气候变化	34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之间发生对抗	20

资料来源: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10年“全球视野: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Global View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的调查。

此外,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于近十年来美国公众的涉台舆论,不同民调机构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美国公众这种弃台倾向是比较稳健的。皮尤调查中心 2000 年的民调结果显示,如果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动武,认为美国应该出兵保护台湾安全的民众也是少数(31%)。^① 1999 年 ABC 新闻网对同样问题的调查或许更能反映出美国民众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虽然 47% 的民众同意当中国大陆攻击中国台湾时,美国应该保护台湾(没有出现“动武或出兵”的字样),但是当选择同意的民众被追加一问——“如果美国保护台湾意味着可能卷入与中国大陆战争”的时候,原本同意保护台湾的人有将近一半(48%)在被追问时改变了态度,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该保护台湾”,另有 15% 选择“如果意味战争就不该保护台湾”,剩下只有 30% 的受访民众坚持“不顾一切保护台湾”,7% 表示不知道。^② 这说明,当重新思考台湾问题时,美国大多数民众更为理性的选择却是“不保护台湾”,这种理性选择的弃台倾向耐人寻味。

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是核心,美国的公众舆论或许是今后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风向标。通过对美国公众涉台舆论的分析,我们认为美国民众对台态度是理性的。在涉台政策方面,普通民众的感情因素和理智判断是截然分开的,且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理智选择是不愿以武力保护台湾。从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中我们发现,近十年美国民众对武力保护台湾的支持率稳步下降。而且,美国民众这种理性的弃台倾向早于近年来美国学界和政界争论较多的“弃台论”。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美国公众会越来越感知到中国的重要性。由我们的统计模型预测,美国公众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是理性的,对于以武力保护台湾的支持度会继续下降。

[收稿日期:2013 - -]

[修回日期:2013 - 06 -]

[责任编辑:张森]

^① 参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② 参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